

# 一部小说的噩运及其他

## ——《刘志丹》从小说到大案的相关谜题

白 烨

**内容提要** 传记小说《刘志丹》，从编辑组稿到作者完成，有一个从革命回忆录到传记作品，再到长篇小说的演化过程。从传记小说角度来看，李建彤最终完成的《刘志丹》，基本实现了作者原来的写作意图，是一部较有文学性与感染力的传记小说力作。《刘志丹》由一部小说演化成一桩大案，是因为涉及了与刘志丹关联密切的“西北问题”——陕甘与陕北、刘志丹与谢子长、阎红彦与高岗、“肃反”的遗留问题等诸多历史旧账。在一定意义上，小说《刘志丹》不仅是一根导火索，也是一面反光镜，反照出了复杂的西北党史与军史，也映射出了置身其中的人们不同的立场，各自的党性，乃至多棱的人性。此外，其中涉及到的写作与批评，文学与政治等诸多问题，也很值得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

作为陕北人民的革命领袖、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西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在1936年4月的东征战斗中不幸牺牲之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永久纪念刘志丹，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在刘志丹陵园落成时，毛泽东作了“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题词，周恩来作了“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的题词，朱德作了“红军模范”的题词。刘志丹闹革命的故事，数十年来一直以故事、传说和信天游的方式，在陕甘和陕北大地到处传扬，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遗产。刘志丹的指挥才能与军事实绩，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央军委研究确定的36位军事家<sup>①</sup>中占据其一，也得到了应有的权威性确认。

但是，这一切既是确定的，似乎又不太确定；既无可非议，似乎又总有争议。这一切的发生，都根源于一部小说。那就是李建彤写作了传记小说《刘志丹》一书。此书又被一位高级干部举报，此事恰好又被长于整人的康生借机利用，毛泽东为此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酿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又演化为“习（仲勋）、贾（拓夫）、刘

（景范）反党集团”、“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反党集团”，株连了数万人为之蒙受冤屈和长期挨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复查意见》，指出“小说《刘志丹》案是一起大错案”，认定“《刘志丹》是一部较好的文艺作品，不是反党小说”。由此，小说《刘志丹》得以正式平反，作者李建彤于1979年在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1983年作者又将原有的一卷加以修改、续写成三卷，于1984、198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先后出版。作者李建彤逝世后，三卷本的《刘志丹》经女儿刘米拉校正之后，又于2009年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的三次出版，因为不同意见者的强力反弹，都有一些曲折与波澜。可以说，围绕着小说《刘志丹》的争议与较量，从来就没有停歇过。

《刘志丹》由一部小说到一桩大案，一直烽鼓不息，争议绵延不断，是因为涉及了与刘志丹关联密切的陕甘与陕北党史，而“党的历史向来有一个‘西北问题’”（陈晋语）。这个党的历史中的“西北问题”，因涉及到陕甘与陕北、刘志丹与谢

子长、阎红彦与高岗、“肃反”的遗留问题等诸多历史旧账，一直是党中央不断出面予以解决，却怎么也解决不完的“老大难”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小说《刘志丹》不仅是一根导火索，而且也是一面反光镜，反照出了复杂的西北党史与军史，也映射出了置身其中的人们不同的立场，各自的党性，乃至多棱的人性。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知，我在多次阅读小说《刘志丹》的同时，也搜集和阅读了与此有关的党史资料、人物传记及相关资讯，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感与认识，试图对围绕《刘志丹》小说发生的一切，做一次认真的探析与可能的解读。

### 一 从传记小说的角度看

《刘志丹》这部作品从组稿到完成，有一个从革命回忆录到传记作品，再到长篇小说的演化过程。据时任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的何家栋回忆：“1953年前后，当时的工人出版社文艺组，提出了一系列革命回忆录选题，《刘志丹》即为其中的一部。这个系列选题中还有《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等等。”“但是《刘志丹》列入选题，一直没有找到作者。1957年，看到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sup>②</sup>给《星火燎原》写的文章，李建彤<sup>③</sup>也和别人合作写了一本小书《刘志丹在桥山》。他们是刘志丹的亲属，有许多便利条件，就想请他们写书。但这时我已被定为右派，正在写检讨，就由王勉思去向李建彤约稿。王勉思是文艺组编辑，大家称她‘政委’。李建彤说她写不了，王勉思说可以合作。最初就由王勉思陪李建彤采访，直到李建彤写出初稿，社里才决定派我去定稿。王勉思把我的情况向李建彤做了介绍，她答应了。”<sup>④</sup>

李建彤在1979年版的《刘志丹》（第一卷）前言中也说道：“《刘志丹》小说究竟是怎样写出来的呢？1956年以前，工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就列有《刘志丹》这个选题。他们有个任务，就是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们偶然碰到了我，就约我写，我没敢答应。虽然在延安时就听人讲过刘志丹同志的英雄事迹，也积累过一些材料，但是在1956年，我还没有决心去写，题目太大，思想、艺术上都

没有准备，怕拿不下来。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着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即使是写小说，也离不开那些事件。回避了那些事件，就不是刘志丹了。后来，在工人出版社的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才答应了。”“写这样一本书，也不那么容易。它不是一个小故事，它是和我们党的历史相连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仅仅做准备，就花了一两年时间。开始，出版社的一个女同志和我一块跑，找线索，查资料。后来我又跑到陕西采访，直到1958年才动笔，同年冬天写出初稿。1959年春，写出第二稿，全是真人真事，人物太多，使人眼花缭乱。夏天，就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共同研究，改成了小说，这就是第二稿。”之后，“第三稿被习仲勋同志否定后，我又跑到陕西采访，补充不足、不透的地方，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看了书样，我觉得粗糙，马上又改，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又印出书样征求意见。”在一些报刊发表之前，“又已改好第六稿”。然而，正是这个第五稿送给“某省一个大干部”<sup>⑤</sup>后，引发出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

由相关当事人相继表明的以上情形可以看出，《刘志丹》一书是由起初选题策划时的革命回忆录，在写作之后改为传记作品，到第三稿后改为了传记小说。在1984年版《刘志丹》（第一卷）“前言”中，作者更为明确地说明道，“第一，这本书是刘志丹一生的经历，不是写党史”；“第二，这本书是传记小说”。传记小说与人物传记是有区别的，后者必须是真人实事，来不得半点虚构与假想，而前者则要求大处有依据，小处合情理，可以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做某些串接、连缀、综合与取舍，以突出主要形象，增强人物的生动性与感染力。《刘志丹》既然是依照传记小说的样式来写作和出版的，就理当以传记小说的尺度来看待它和评说它。那么，从传记小说的角度看，《刘志丹》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又是否达到作者原有的写作追求呢？

在仔细阅读了先后出版多个版本的《刘志丹》<sup>⑥</sup>之后，我认为，它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较好地实现了作者“为那个时代留下较多的真实记录”，“为后人留下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sup>⑦</sup>的写作意图。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来看。

第一，作品以大量生动而具体的细节描写，表现了刘志丹的成长过程与革命历程，以及他坚强的意志与杰出的军事才能。《刘志丹》的第一卷，从刘志丹的少年时代依次写到他的求学与励志，领导学运与入学黄埔，一直到渭华起义失败后之回到陕北与陕甘，由兵运、兵变开始组建工农游击队，并在遭致失败后认真总结应有的经验与教训。如果说第一卷主要以细腻的笔墨，主写刘志丹如何成长为一个清醒而坚定的革命家的话，那么，第二卷、第三卷则主要以如椽大笔，书写刘志丹如何在一次次非难中挨整，又在一次次挫折中奋起，与他的战友们不断地从毛泽东的农运理论和朱毛红军的基本经验中汲取思想营养与前进动力，在陕甘交界的稍山地带开辟出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在与外在的强敌土顽，内在的“左倾”错误领导的双向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这些描写，虽然纷繁复杂，却也并不重复，并且由此自然而然地托出刘志丹内在地把握着历史的趋势，历史也选择了刘志丹的基本趋向。

第二，作品以依托于史实的丰繁而曲折的情节，描写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艰难过程，以及刘志丹在其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谢子长、刘志丹在1930年从事兵运起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932年底以甘肃正宁寺村塬为活动中心，1933年初至10月以陕西耀县照金为活动中心，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以甘肃庆阳南梁为活动中心。根据地活动中心的转移，既与敌我斗争的进退有关，也与党内斗争的得失有关。《刘志丹》以忠实于历史的人和事，如实反映了陕甘根据地的建立与转移的大致过程与基本脉络，尤其对李可夫、杜康、张金等“左倾”分子对于根据地和红军从内部加以损耗和破坏的具体过程与剧烈程度，描写得最为深切细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志丹》在这一方面的描写，甚至是以党内、军内斗争的经常性与惨烈性为主的，而且写出了这一地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特殊性与艰巨性。而正是由于把这一点写深、写透，也写活了，才更显示出刘志丹与他的战友们坚持正确路线的艰难困苦与难能可贵。正是刘志丹的这种超常的坚韧，这种顽强的坚持，才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有了自己的主心骨与向心力，虽然不断转移落脚点，不断遭受挫折与损失，却能

依然得以生存和发展，“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sup>⑧</sup>。

第三，作品以很多小穿插、小情趣、小人物的营造与布排，构成了总体上的一种丰富性，使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作为传记小说，需要用一定的文学性元素来丰润作品的主要人物与滋润作品的主干故事，比如小故事、小情节、小情趣等等。作者在《刘志丹》一书的写作中，既注重总体布局，也注意具体描写，一些细部描写的技巧也运用得比较帖当。比如，作品里写到刘志丹与宜如、罗武两位好友在永宁山上智救阎小盛，就颇带一种武侠小说的笔法，读来如传奇故事；还如作品里的冯蕙琼<sup>⑨</sup>这个人物，既是青年学生积极投身革命的一种表现，又让她以女性的贤良、柔美及与王兆平的缠绵恋情，给作品添加了一抹温馨而浪漫的色彩。还有李可夫这个人物，也是以先极端左倾，后又幡然悔悟的变化，成为作品里一个颇有特点和意义的角色。已经觉悟了的他，既映衬着杜康等人坚持左倾错误的固执与可恶，又反证着刘志丹等人坚持正确路线的难能与可贵，事实上成为了一面擦掉蒙尘又映照正误的小镜子。

作品的语言文字，晓畅而简洁，质朴又雅致，无论叙述与描写，还是对话与议论，都力求明快，毫不拖泥带水；其中较难把握的观点争论、会议讨论等，也是感性与理性相伴随，生动的比喻与粗粝的实话相杂糅，既不显得枯燥无味，也紧贴着人物的身份与历史的实际。

以上这些都向人们表明，即使是从传记小说角度来看，李建彤最终完成的《刘志丹》一书，也基本实现了作者原来的写作意图，是一部较有文学性与感染力的传记小说力作。

## 二 也从党史的角度来看

《刘志丹》是一部传记小说，并非人物传记，更非党史著作。那些只从党史的角度对这部作品一味提出质疑的，要么是违背文学规律的额外苛求，要么是怀有政治性意图的影射批评。但《刘志丹》涉及到刘志丹及相关的人和事，毕竟也与西北党史有所关联。那么，从党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又会有什么发见呢？我的看法是，《刘志

丹》在描写刘志丹的经历与他的亲密战友的部分,基本符合实有的历史事实,没有什么大的疏漏,而描写刘志丹的党内对立面的部分,在基本符合事实的同时,确有作者的某些艺术加工。

与实有的陕甘与陕北党史相比较,《刘志丹》里写到的一些人物,有的是以某一人为主要原型的文学塑造,有的则是以多人为底色的形象综合,很难一对一地去对号入座。比如,有人说罗炎就是高岗,其实罗炎这个人物从杜康主持改编陕甘游击队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时出任团长等情节看,很有一些王世泰经历的影子,而那个生活作风较为随意的陈宏,反倒许多作为更像当时的高岗其人。作品中的形象与实有的人物相似度比较高的,主要是杜康——杜衡,方自强——谢子长,戴鸿远——阎红彦,申超人——郭洪涛,曾光——朱理治等。在这些人物形象的把握上,作者在不走大样的前提之下,也在一些细节上有自己的些许加工,这些处理使得本有分歧的历史矛盾,就有了被重新提出和再度燃起的可能。

书中的杜康所指涉的杜衡,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初期,从内部起了极大的破坏性作用,这个人物后来又叛变革命,完全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因而在作品里怎么描写,也不会引起歧义。问题主要在于方自强——谢子长和戴鸿远——阎红彦,这两个人物在西北党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小说中对某些分歧的毫不回避,又使这一分歧以小说的方式进一步放大了。

年长刘志丹六岁的谢子长,一直被刘志丹尊为老大哥式的老战友。<sup>⑩</sup>两人从渭华起义开始,在陕甘兵运、西北闹红等革命活动中,经常合作,互为搭档,在陕甘、陕北与西北根据地的开拓、红军部队的组建中,都居于主导的地位,堪为双星式的革命领袖。但由于此后两人所属的党的组织隶属于不同的系统<sup>⑪</sup>,也由于谢子长的为人持重、谨慎,刘志丹处事的通达、灵活,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分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嘉塬事件”。此事发生于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的陕北游击队到达南梁之后。这支游击队经由陕北到达南梁,与南梁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担任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一支队以陕北游击队为主,队长为来自晋西的师储杰,二支队以南梁游击队为主,

队长由刘志丹兼任。1932年2月6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三嘉塬整顿期间,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对反帝同盟军如何整顿、苏区在那里开辟和‘官兵月薪一律10元’等问题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发生了一支队收缴二支队枪支并打死干部战士5名,同时也震动了一支队内部,第三天晚上师储杰带领旧部出走,投奔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sup>⑫</sup>。关于这一事件,事实上已有过结论性的说法。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缴另一部分枪的办法,特别是在谢、刘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志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sup>⑬</sup>发生这一事件后,刘志丹对谢子长一度不满,去往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领导机构也重新作了改组,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1932年4月份,杜衡、黄子文从省委来到部队,批评游击队“游而不击”,是“稍山主义”,随即撤销了游击队总指挥部,也撤了谢子长的职务,将队伍分成三、五两个支队,分别由随同前来的刘志丹和阎红彦分任支队长。这次事件是刘、谢之间分歧的一次公开表现。谢子长、阎红彦等认为,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有“游民武装”的“土匪”习气,并不经刘志丹的同意,便公开缴枪。<sup>⑭</sup>这里透露出来的是,当时的谢子长既与刘志丹观点不同也对他不很信任。当然,以后经过阎家洼子联席会议和两个根据地的协同作战,两人商议两个根据地统一党的组织,统一军事指挥,并力荐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sup>⑮</sup>。这些已足以说明谢子长对刘志丹又有了重新的认识,已表现出对于刘志丹的高度信任。

《刘志丹》在表现这一段历史时,基本上遵循了真实事件的大致脉络,并综合了当事人的回忆与叙述,都没有溢出历史的事实,包括作品中的刘志丹后来回忆三嘉塬事件的说法。作品中的谢

子长的代言形象方自强,<sup>⑥</sup>其较为突出的表现,主要以十亩塬(即历史上的三嘉塬)缴枪和阎家洼子会议为主,而这两次事件都表现的是方自强既在观点上与刘志丹不和,又在气势上凌驾于刘志丹之上,没有具体地描写出刘、谢之间既有分歧又有信任,既有矛盾又有合作的别的事例,以及谢子长的丰富革命实绩,观感上既显得个性不无偏执,整个人物形象也显得比较单薄。

如果说谢子长的形象——方自强在《刘志丹》里稍显薄弱的话,那么,相比之下的阎红彦——戴鸿远,在《刘志丹》中则不仅比较丰满,而且相当正面,包括被拉拢时不动摇,关键时刻顶得上,受委屈时不气馁,既属于靠近刘志丹的基本骨干,也是陕甘红军部队的主要领导。这样的一个形象塑造,应该说是与阎红彦本人在陕甘根据地、西北红军中的实际地位是基本相称的。

《刘志丹》里写到的申光——朱理治、申超人——郭洪涛,在历史的真实性上,都多少带了些文学性的色彩。朱理治因为身任陕甘晋省委书记,在陕北、陕甘反“右倾”和大“肃反”中,是主要的领导者,但他在所有的相关责任人中,是对所犯错误和自己的责任认识得最为深刻的,他说道:“我当时和刘志丹在路线上有很大的分歧,因此才有很多的斗争”,“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路线有何错误,只想到有右派在那里搞鬼,所以就要来一个硬干”。“‘肃反’整个的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sup>⑦</sup>用他上述这些自我批评的说法来比照《刘志丹》里的曾光的形象,应该说基本不走大样。

而西北党史上的郭洪涛,却要比作品里的申超人更为复杂。作品里的申超人,政治上极端左倾,而且带着浓重的个人主义与领袖欲望,拉大旗作虎皮,借着整人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事实上,很早参加革命的郭洪涛,1934年初刚从河北省委回到陕北特委,他并不很熟悉陕甘的情况,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大力整治刘志丹等人,但他的颇具个人偏见的《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让北方局和中央代表团对刘志丹等人的所谓“右倾”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给刘志丹等人戴上了“右倾取消主义”的大帽子,并在出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时,与朱理治等一起领导了错误又过火的“肃反”,致使所谓的“肃

反”愈演愈烈。对此,他自己在多次的检查中,对主要方面的问题也供认不讳。<sup>⑧</sup>路线斗争层面的反“右倾”,与敌我斗争层次的肃清“反革命”并非一回事,但却有密切的关联。郭洪涛作为前一事件的诱发者,后一事件的领导者之一,确实难辞其咎。很有意味的是,从延安时期直到他逝世之前,他一方面多次做检查,一方面不断做申诉,致使中央从40年代到80年代以来,就此不断地开会予以解决。<sup>⑨</sup>所谓纠缠不休又又纠扯不清的“西北党史问题”,与此密切相关。

在我看来,历史问题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主要从当时的认识分歧及路线斗争的角度去认识过往的争论与事件,不要舍主求次,更多关注个人的品质,更不要把历史事件化为心结,越积越深。可惜,现在表现出来的,恰恰是后者更多,这正是许多问题纠扯不清的症结所在。

### 三 被判“反党小说”的理由均不成立

小说《刘志丹》在阎红彦向中央书记处一再反映意见之后,便被康生及时抓住并大加利用,罕有先例地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印发小说《刘志丹》第一卷的样稿,大讲“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并被最终定性为“反党小说”。被认为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也由此发布出来,那就是在谈到如何对待国内外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话题一转,拿出康生递来的纸条说:“利用小说反党<sup>⑩</sup>,是一大发明。”其实反过来看,康生等人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构陷,何尝不是更大的发明。

以康生为主要负责人的“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按照三个步骤对《刘志丹》一书作者的写作背景、写作过程,及相关关系人的情况等,进行了一系列扩大化的寻索与放大性审查,在先后于1963年和1966年所做的《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中,挖空心思地找寻错误,罗织罪名,这些问题大致是:第一,“夸大和歪曲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第二,“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吹捧刘志丹”;第三,书中的某个人就是习仲勋,“写得年轻能干,是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只要认真阅读过作品、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得出以上的惊人结论,

甚至压根想象不到会有如此的解读,因为这些都是出于险恶的政治用心,属于典型的无中生有,恶意的穿凿附会。据当时供职于中宣部文艺处并一度参加过专案组的黎之(即李曙光)回忆,当时的所谓审查,包括了内查外调,一个重点是寻找“为高岗翻案的例证”,“另一个重点是《刘志丹》同习仲勋的关系”。“记得当时多次整理的材料都被他(康生)驳回,说是没有抓住要害。”<sup>⑩</sup>

《刘志丹》是传记小说,它只是以刘志丹为主角和代表,描写在他主导下的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及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艰苦过程,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它并非是一本中国的革命根据地全史或大传,既不是纵论所有革命根据地,更不是比较描写中突出西北,何来“夸大”一说;更为奇怪的是,还有一个“歪曲”,这种把“夸大和歪曲”组合起来的说法就很令人费解,到底是“夸大”,还是“歪曲”,看来连审查者本人也并不清楚。至于说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不说是有意栽赃,也是信口胡扯。这个人物明显地是多人形象的综合,在小说中的地位并不重要。硬要把这个人物说成是高岗,只能说是没事找事,要给小说扣上“为高岗翻案”的罪名寻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而已。

所谓“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吹捧刘志丹”的说法,也是借助一个吓人的说法,把小说的问题上纲到政治的层面上。事实上,小说中的描写恰恰与此结论相反,一再描写刘志丹如何向毛泽东学习,从而有了思想的依托和前进的方向。如渭华起义失败之后,回到陕北的刘志丹,就跟战友们说:“陕甘没有井冈山,但有大稍山,我们要照着毛泽东、朱德的样子去做,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井冈山是咱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榜样”。<sup>⑪</sup>在第二、第三卷中,都有很多刘志丹等人在困难和迷茫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从井冈山和毛泽东那里汲取经验的具体描写。这种学以致用的虚心“取经”,硬是被认定为自我“吹捧”,这种有意的误读与作品的实际实在是南辕北辙。再者说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sup>⑫</sup>在这“许多

卓越领导人”中,也理应包括因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有功而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的刘志丹。退一步说,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组建西北红军的几起几落中,学习毛泽东,借鉴井冈山,并在实践中获得启迪,总结出接近于毛泽东思想的自身经验,难道不应该,难道也有罪?至于所谓“吹捧刘志丹”的罪名,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毫无道理,刘志丹难道不该吹捧吗?李建彤在小说《刘志丹》中对于刘志丹的描写,超过了毛泽东“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题词吗?这一说法,只顾了给《刘志丹》一书寻找罪名,完全忘记还有毛泽东等领袖的题词,更亵渎了革命先烈刘志丹的英名。

至于“书中的某个人就是习仲勋,写得年轻能干,是为习仲勋篡党夺权制造政治资本”,这也是一个虚假又可笑的罪名。书中的某个人,其实指的是书中曾任照金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徐一知,这个人物除了习仲勋的经历,还揉有周冬至等人的事迹,而且在作品里的重要性尚不及李可夫、迪伯仁、王兆平等,与罗炎、马罗武、葛明山等属于次一级的主角人物群体,这与习仲勋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实际地位并不相符。因为高岗的地位与职务的时起时伏,在照金和南梁,习仲勋都是以陕甘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主持政务,与主持军事工作的刘志丹长期搭档,亲密合作,是仅次于刘志丹的第二把手。如果硬要与党史相对照,徐一知这个形象与习仲勋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应,可以说,写少了,也写低了。而即便如此低调地去写徐一知,“写得年轻能干”也是罪,这还叫实事求是吗?至于“是为习仲勋篡党夺权制造政治资本”,更是无稽之谈。且不说习仲勋一直是小说《刘志丹》写作的反对者,即便他同意写作,也扯不上“制造政治资本”。这个“自少年就投身革命,几十年来勤勤恳恳,艰苦奋斗,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sup>⑬</sup>——13岁参加革命,20岁当上陕甘特委军委书记,21岁时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32岁时当西北局书记,34岁上出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解放后被毛泽东称为已“炉火纯青”的老资格的革命家<sup>⑭</sup>,还需要通过别人的一部传记小说来为自己“制造政治资本”吗?所谓“篡党夺权”,也是用心险恶,毫不足信。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当

习仲勋知道自己要被提名为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后，就立即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诚恳地表示“我仍乐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的工作岗位（指秘书长），多做一些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样，于工作无损，对自己可能更有好处。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副总理”。<sup>⑥</sup>硬要给如此低调并已位居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扣上“篡党夺权”的大帽子，这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 四 酿成大案的主因及习仲勋等人的被牵连

《刘志丹》从小说酿成大案，阎红彦一个劲地向上面反映的意见是导火索，康生的借文学题目作政治文章是炸药包，而使这两者连接起来并最终造成爆炸的，应该是毛泽东本人。

对于毛泽东而言，于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思想变为全党的政治战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这个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sup>⑦</sup>。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在讲阶级，讲矛盾，批评各种翻案风时，与会的康生精心准备了有关小说《刘志丹》的材料，递上了上文所述的那个“条子”。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接着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康生趁机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个人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康生还建议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小说《刘志丹》，审查习仲勋。毛泽东决定接受康生的建议，并决定成立由康生总负责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委员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马文瑞等人被认定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指使者与策划者，之后又牵连到更多的人，由此成为一桩当代罕见的文字冤案。

其实，习仲勋不仅与《刘志丹》的写作事先毫无瓜葛，而且知道李建彤在写《刘志丹》后，几次劝说李建彤“不要写刘志丹，免找麻烦”<sup>⑧</sup>。

之后，还请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对她进行劝说。在审看第三稿时，不仅“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而且仍然“不同意出版”。后来，在刘景范、马锡五等陕甘老同志的劝说之下，由反对写作与出版变为不反对写作与出版，并几次提出“不要写高岗”<sup>⑨</sup>。如果要写，也要“通过刘志丹这个革命领袖，写西北革命，写整个一个时代，写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写好。要根据西北党史把陕甘苏区写成坚持正确路线的缩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缩影”<sup>⑩</sup>。

李建彤在1979年版《刘志丹》“前言”中说：“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还担任过西北局书记，不送给他看，则是我的错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建彤把小说样稿送给习仲勋看，才是更大的错误。虽然事情后来的发展为她所始料不及，但就是这个“送他看”，便使习仲勋难脱干系（当然，不看也显然难脱干系），甚至由此被妄加揣测，肆意联想，作了这样荒诞之极的判断：“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这样由“第一作者”到“反党集团首领”，就自然而然地挂上了钩，定准了位，习仲勋从此就在劫难逃了。在接受审查的数年内，习仲勋就被全面停职，之后又以“妥善安排”的处理，撤销了所有职务，于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又遭受关押、监护长达8年。习仲勋夫人齐心就此回忆说：“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五七’干校劳动就有七年之久。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sup>⑪</sup>一直到毛泽东于1974年12月21日作了“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提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的批示之后，才解除监护，但所谓的“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直到粉碎“四人帮”数年之后的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的内含为习仲勋平反内容的《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之后，才洗刷了罪名。这些时间累



加起来,一共是17年。一桩冤案持续了17年之久不能昭雪,一部小说祸及了老资格革命家的政治前途,这在副总理级别以上的国家领导人中绝无二例。

作为小说的作者和作者的丈夫,李建彤和刘景范自此完全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建彤,长期被停职审查,“文革”期间,多次被抄家和批斗,1968年1月后被关押。1970年春下放江西省峡江县“五七干校”劳改,1972年底,由于伤病严重,回北京治疗。“文革”结束后经多方努力终于平反,但已瘫痪在床,直到2005年去世。而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景范,被定为“反党集团”的三号头目,调至中央党校学习,实为闭门思过。“文革”中因痛斥康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长达七年之久。直到1974年12月才重获自由,由于长期关押和折磨,身心俱损,于1990年不幸病逝。

《刘志丹》一案除了习仲勋、李建彤、刘景范受审查之外,先后被定为“反党集团”二号头目的贾拓夫、马文瑞也备受摧残。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被撤职下放到抚顺发电厂任厂长,后又任石景山钢铁公司副经理,1967年5月被迫害致死。贾拓夫死后,又将曾接受李建彤采访的劳动部长马文瑞换来接替,马文瑞因此被关进监狱五年。在专案组进行审查的1962年到1965年间,大批西北五省的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接受审查,并被诬为反党分子。出版《刘志丹》一书的工人出版社社长、总编、编辑室主任、副主任、责任编辑等,无一幸免。社长高丽生、总编吕宁在审讯中被摧残致死,其他人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审查与批斗时,全国总工会、地质部的领导人都被揪来陪斗。之前已被打成右派的责任编辑何家栋被停职检查,罪加一等,后来全家被下放到农村。另一位责任编辑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惨遭批斗。据何家栋回忆,他们所采访过的所有西北籍的领导人,都上了“反党集团”的黑名单。据李建彤在她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sup>⑥</sup>中记述,受到牵连的西北籍或在西北工作过的老干部(包括已去世的)还包括白坚、马明方、潘自力、李志舟、高登榜、高锦纯、王兆相、王恩惠、王子宜、吴台亮、高朗亭、赵连璧、朱理治、张邦英、赵耀先、方仲如、秦川、杨明

轩、马明方、张秀山、张鹏图、王世泰、裴周玉、张策、赵伯平、黄罗斌、吕剑人、孙作宾、黄子祥、刘威诚等一大批人,他们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受到株连的还有彭德怀、何长工、宋任穷、马纯古、张修竹、周扬、柯仲平、田野、张松涛、石鲁、秦川、苏一平、曹冠群、闻捷等人。更为不可思议的是,1962年从西北五省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20多位省级干部也都因涉及“反党小说”而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成员: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不料也被当成了严重事件,来吃饭的人都被认作参与了写作《刘志丹》的阴谋活动。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人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此案到“文革”开始后,追查和整肃进一步扩大,受株连者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从各级干部和平民百姓,以至那些彼此有联系但与小说毫不相干者,总计六万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与处理,很多人被迫害致死。此案牵涉之广,株连之多,比此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 五 阎红彦意见的表面与后面

作为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阎红彦是有资格对传记小说《刘志丹》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与不同看法的。鉴于《刘志丹》以描写陕甘根据地并以刘志丹的业绩为主,对阎红彦更为敬重的谢子长的描写不无单薄又有些许偏颇,包括对他自己在小说中的形象代表也不足,阎红彦的不满乃至愤慨,是可以理解的。

阎红彦在李建彤于1956年采访他时,两人曾就有关问题发生过争论;在李建彤完成《刘志丹》的写作并把小说稿送给阎红彦的第二天,“他还没有看,就给我(李建彤)写了一封信,认为书中有些历史,中央没有做结论,作者负不了责任,不同意发表”。作者没有理睬这些意见,阎红彦也没有轻易罢休。1962年8月17日,阎红彦致信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对



小说《刘志丹》提出三点意见：“1、它重新肯定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拔高为全国的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是年8月24日，又致信杨尚昆，要求中央书记处严肃处理《刘志丹》问题。在8月26日至9月23日在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与正式会上，阎红彦又提出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并在发言中说：“如果只涉及到我自己和在这个地区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的个人问题，《刘志丹》这本书我也同意发表，问题在于，在对刘志丹本身的宣传上，它也是违反历史事实，违反历史观点的”<sup>④</sup>。更有甚者，也是在这次会议的西南组会上，阎红彦还特别说到，在当前国内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sup>⑤</sup>显而易见，阎红彦对于小说《刘志丹》的意见，是带有根本性的，是基于由来已久的历史积怨的，也是针对着习仲勋等与自己观点有所不同的西北老同志的。

在阎红彦的三条意见中，第一条是“它重新肯定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这一说法是大可商榷的。说“高岗篡改西北革命历史”，是一句十足的气话，高岗没有撰写过或主持编纂过总结西北革命历史的书籍，这里实际上指的是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高岗代表西北局所作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这次会议是在中央书记处的主导下召开的，高岗的报告综合了包括阎红彦在内的许多老同志的发言与意见，实际上是代表西北局和中央对边区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特别是对“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进行总结，研究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194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对会议所作的历史结论表示满意。毛在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讲到两个重要问题：一、错误路线搞光了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二、西北的结论与全党的结论“是相同的性质”。<sup>⑥</sup>

曾任西北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的马文瑞在谈到西北局高干会议时说道：“会议期间，党中央在充分听取讨论和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作出

了《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肃反问题作了正确的定性，解决了几年来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争论。会议最后，高岗所作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是在会后，经胡乔木、贾拓夫同志加工整理，又经过一些同志反复讨论修改定下来的。今天来看，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还是正确的。因此，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基本上应该肯定”。<sup>⑦</sup>曾任西北局委员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于1981年在西安同党史研究者谈话时，明确肯定了三条史实：“第一，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位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讲话记录送原陕北、陕甘几位负责同志看过，都表示同意”。<sup>⑧</sup>在“七大”闭幕之后的1945年7月，有人对西北局高干会议有看法，西北局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了一次“西北党史座谈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座谈会”，“西北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再次对陕北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座谈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再次澄清了西北党史上两条路线中的是非，维护了《党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sup>⑨</sup>其实，阎红彦于1943年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时，在支部的发言和向学校领导反映意见时，也发表了否定“肃反”和肯定刘志丹的同样意思的意见，他说：“过去我们苏区肃反教训也不少。我们陕北苏区的肃反，连刘志丹这样一些同志都抓起来。如果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sup>⑩</sup>这与高岗报告里关于肃反的结论，并没有什么不同。高岗后来发生了问题，但中央在当时处理他的问题时也是从1949年主政东北时说起，以1953年为主<sup>⑪</sup>，也没有追溯到延安时期。所谓“它重新肯定了被高岗篡改了的西北革命历史”，只能说是阎红彦借高岗事件说事，把小说的问题政治化，把个人恩怨正当化的一个借口。

第二条意见“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拔高为全国的领袖”，也是脱离小说实际的主观判断。小说《刘志丹》只是在陕甘、陕北的范围之内书写刘志丹，没有涉及其他革命根据地，更没有写刘志丹如何主导和影响全国各地的根据地。“拔高为全国的领袖”一说，小说中没有依据，理由从何

而来,让人不解。这一说法的背后,显然另有玄机。

第三条意见“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这一条可能是阎红彦真正想说的话。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西北革命领袖,但因谢子长比刘志丹早一年去世,其活动与影响,在陕北多于在陕甘,在以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史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中,谢子长较之刘志丹的篇幅为小和分量较轻,应是符合历史、合乎情理的。就从陕甘根据地创建中的作用来看,刘志丹的作用也较谢子长更为重要。这一点,在谢子长逝世之后由毛泽东题写的碑文中,也有明确的界说:“‘九一八’事变后,(谢子长)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第二十六军之前身。1933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高岗诸同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sup>⑩</sup>小说《刘志丹》对方自强——谢子长这个人物形象的实际把握也确有不足和偏颇,但“随意贬低”的说法,也明显太过。至于“其他老同志”这种虚说,指的是一些什么人,很难猜度,这种把小说人物与党史人物完全对号入座的做法,也明显欠妥。

阎红彦在1967年的“文革”期间不幸去世,于今已有40余年。很难猜想阎红彦看到因为他对小说《刘志丹》的政治性举报,使一部小说作品演化为一桩反党大案,并在审查期间和此后的“文革”中,致使数万人被批斗、被整死,有什么样的感想与感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未必会像有些人这样以所谓坚持真理的方式来坚持错误,以所谓说明真相的姿态来混淆是非。

## 六 小说成大案的教训与感言

《刘志丹》从一部小说到一桩大案,起起伏伏,波澜不断,延宕至今已52年。小说《刘志丹》的成事又成案,涉及到写作与批评,文学与政治等诸多问题。在我看来,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与教训,较为重要,也很值得注意。

第一,涉及政治领域、党史领域的小说(包括传记小说)在写作与批评两方面,都需要注意其特殊性,并采取审慎、求实的态度。文学写作

本无禁区,有关政治活动、革命斗争、党史人物等,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用文艺作品的形式加以反映。在这一方面,成功的例证已有不少,如小说《红岩》、《红日》、《保卫延安》等。但这些作品侧重于英雄集体的群像塑造,偏于革命的武装斗争描写,属于正面歌颂式的文学写作。真正以党史中某些复杂事件、某个重要人物为主,用小说的方式加以成功表现的,委实并不多见。在这一方面,《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可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这一写作探索取得相对圆满的成功,那将会对党史人物的传记小说写作取得可资借鉴的重要经验,但因为特殊时代的特殊际遇,特殊人物的特殊反对,《刘志丹》因迅即进入政治的层面而遭到批评与批判,或又纠结于党史的层面争议不休,其文学上的成败与得失,就完全被忽略了,包括之后许多人都 在谈论《刘志丹》一案,但是否真正了解作品本身,或读过全书再来说话,这显然都很令人怀疑。

客观地来看李建彤在《刘志丹》写作中的艺术表现,应该承认,她在她自己的原有的基础上已尽心尽力,竭其所能,这包括她的认真采访、研读党史、长期准备,包括她的语言功力、文学技艺、创作激情等,都有相当丰沛的积累与比较充分的酝酿,堪称稳扎稳打,有备而来。而且,从素材的选取与提炼,故事的构思与叙述,人物的糅合与塑造,以及以次要人物衬托主要人物,写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等方面来看,作者都有很好的把握与运用,从而使作品颇具小说的模样,为传记小说中文学性较好的一种。但作者李建彤在构思和完成作品时,较多地关注了主要人物刘志丹本人,而对环绕着刘志丹的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有些轻视,或者有些大意。习仲勋当初就一再劝她不要写,“因为事情太复杂”。“但我没有接受习仲勋、刘景范同志的意见,还是决定写了”。<sup>⑪</sup>《刘志丹》一书较多地写到了陕甘、陕北根据地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就此她在“前言”里回答“为什么写路线斗争”的质疑时,曾理直气壮地回应道:“毛主席叫写路线斗争的。”这些说法虽然显得既有所本,又非常有力,但却并不能构成对于作者书写路线斗争的有力支持。因为这既在于作品具体怎么写,更在于就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而言,表现这种政治性极强的路线斗争实非所长,

难免挂一漏万，有所偏差。正是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作品被阎红彦看到了问题，抓住了把柄。从习仲勋等人的苦心相劝，李建彤的一再坚持来看，作者李建彤对《刘志丹》这部作品的写作既充满了自信，也对这部作品可能涉及和引发的问题无所顾忌。在这后一点上，不能不说是她因缺少应有的政治经验，对于涉及革命领袖更涉及复杂纠葛的作品内容，缺少缜密的考虑与必要的谨慎。

《刘志丹》这部作品的写作及其遭际，从另一方面告诉人们，文学作品与政治的关系既脱离不了，又难以把握；在涉及到复杂的历史尤其是党史问题时，更要以审慎的态度，从文学的角度去扬长避短，紧紧把握住审美这把尺子，避免进入政治性的漩涡。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文学作品就是文学作品，即使是一部涉及党内斗争的作品，也不要把它看成是政治的“手雷”，夸大为“反党”的工具，进行政治批判。黎之的一番有感而发的议论，确实不无道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刘志丹》一大案在邓小平的直接批示下彻底平反。小说《刘志丹》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我至今未及细读。听说后来又停止发行了，详情我毫无所知。不过以我幼稚的想法，一本书只要不害国害民，还是让它发行，有什么不同意见展开争论，也许对历史、对文艺、对读者都会有些好处”。<sup>③</sup>

第二，在对不合己意的作品和有争议的现象发表意见时，一定要从作品全局出发，要实事求是，要留有余地，不要无限上纲，更不要意气用事。一部作品走上社会之后，读者见仁见智，都会自有看法。但围绕小说《刘志丹》发生的争论，一些意见和现象，却不能说都是正常的。

即以阎红彦的意见来看，他确有反映意见的权利，但他的意见与做法体现出来的一些观念，却又不无偏颇之处。比如他压根就没有把《刘志丹》当传记小说来看，直接就认为作者是通过对于路线斗争的描写，在政治上为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做结论。这就把《刘志丹》看成了变相的党史总结与政治著作，为此他还对作品人物与党史人物做了详细的人物对照表。这种越过文学，直奔政治的看法与做法，只顾了表达自己最为直接的观感和由此生发的联想，压根就没有对这部具

有小说化特征的作品给予适当的对待与应有的尊重。另外，阎红彦在作者李建彤采访他时对作者所说的：“你不要写刘志丹，不如写谢子长。”这随口而出的话里，不仅明显地强人所难，而且表现出一种宽容意识的严重缺失。李建彤要写刘志丹并已经在写《刘志丹》，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家去写刘志丹，反过来要人去改写谢子长？再说，李建彤可以去写刘志丹，别的人可以去写谢子长，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作为一个老革命，完全可以大度一些，宽容一些。但是很可惜，这些他都没有做到。

所以，小说争论的背后，是政治历史的分歧；政治历史分歧的背后，是人的不同意识与观念，乃至不健全的意识与观念的碰撞。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最难解决的。

第三，对于党史中的历史旧账，相关当事人都须有一种超越意识、大局观念，主要责任人更应有一种自省意识、担当精神，不要总是纠结于具体是非，斤斤计较于个人恩怨。

作为一个党史爱好者，我对有关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历史尤感兴趣，在比照研读了一些在同一事件上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说法时，历史上原有的分歧与后来累积的忧怨，以及不同的人由此表现出来的立场与姿态，视野与胸怀等，看起来十分的错综和缭乱，细究起来，个中的某些端倪却也清晰可见。

比如，“三嘉塬”事件，显然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与刘志丹、刘景范、马锡五等人，在如何利用和改造草创初期的革命队伍上有不同看法，背后可能又联系着不尽相同的思想路线，也即所谓的“左”与“右”的问题。这样一个事件在此后的多次提起，以及阎红彦的固执己见，根子都在这里。但比较而言，也是事件见证人的王世泰，在《回忆我的红军生涯》中的相关看法，显然更为客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判断是非，亦无须责怪某个组织和个人的，这是因为，一是我们党还不够成熟，左倾机会主义还占居主导地位，这是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二是我们的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还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和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难以对具体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和抉择”。<sup>④</sup>

还有陕甘、陕北的“肃反”事件，看起来并

不是一个复杂莫辨的事件，却在相关的认识上长期争议不断，从30年代到40年代，从解放初到80年代，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多次争论与讨论，反复申诉与争辩，一些当事人都各有各的说法，把这些综合起来看，就会感到在一些主要问题与责任过失的认定与认知上，有些的确是有道理的，应该给予纠正或修正。如1935年11月间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肃反”事件时，虽然宣布刘志丹等人无罪，给聂洪钧、戴季英以党内处分，但却因受朱理治等人看法的影响，仍在刘志丹的档案里留有“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的记载，此事也涉及到许多被当作“肃反”对象的刘志丹的战友，经过不断反映，“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后才做了彻底平反的结论”<sup>⑤</sup>。但有一些看似不无道理，实则属于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与评价。如郭洪涛对于中央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之后所作的《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对他在陕北特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主持肃反”，以及“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等结论有不同意见，以为与具体事实有不同程度的偏差，因而锲而不舍地不断申诉，并把西北局高干会议讨论之后形成的中央的决定说成是“高岗歪曲历史事实，引起西北干部的长期意见分歧和争论”<sup>⑥</sup>。这在力求更为准确的责任认定与问题定性中，也有力求把程度说轻一些，把责任减少一些的个人意图。错误事件的责任人能像朱理治那样襟怀坦白，勇担责任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在这些年的《中共党史资料》和《革命史资料》中，不时能见到当年参与领导“肃反”的责任人之间相互问责，自我辩白的文章与文字。你会感到在一些过失与错误的责任认识上，有些人是能避就避，能推则推，至于许多人在其中蒙冤与受难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或者被放置于次要的位置，或者干脆就被淡忘和弃之不顾了。“肃反”的由来由此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这跟主持其事的责任人或避重就轻，或讨价还价不能不说不无关系。也是西北地区的老干部的张策，出于深刻的亲身体会，曾向习仲勋、张秀山等战友一再表示，“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还说“有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西北的同志总是为过去的历史问题争论不休。这不是争谁高谁低，不是团结不团结的问题，这是一个党性问题，这

是为了维护党史的真实性与严肃性”<sup>⑦</sup>。张策的说法，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西北党史长期纷争的缘由，也许还有益于人们反思蕴含在其中的不同人的“党性”之所在。

第四，从一部小说由文学写作到被判定为政治翻案，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党内频发的以“左”反“右”的历史事件来看，其中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和更深的背景，是在党的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左”倾错误总是屡反屡犯，循环往复，这更值得人们深加反思和深入探究。

《刘志丹》一书从文学领域直接进入政治层面，很快就被判定为“反党小说”，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密切相关。而《刘志丹》一作引起阎红彦的严重不满，也事涉西北党史中的“三嘉塬缴枪”和1935年“肃反”。而这两个事件，也是因为过火的以“左”反“右”，造成了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并引发了长久不息的争议。

党在建国前的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中，因为以“左”反“右”的斗争频频发生，使党在夺取胜利与自身发展的经历中，充满了曲折，历尽了坎坷。先后发生的1931—1932年的鄂豫皖“肃反”，1935年的陕甘“肃反”，1939年的湖西“肃托”，就是其中最为惨重的内耗事件。在鄂豫皖“肃反”中，张国焘等人以种种残酷刑罚杀害了红四军多少干部战士，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sup>⑧</sup>1935年的陕甘“肃反”，以所谓的“反右倾”为借口，大搞“逼、供、信”，捕杀了200多名党政军干部，其中多为红二十六军

2012年8月20日—26日再改；

2013年11月—12月改定。

连级以上、陕甘边游击队长以上的干部骨干；而湖西的“肃托”，以所谓“肃清托派分子”为理由，错杀了300多人，多为区、县、地级忠诚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内部大屠杀，当时由于主要从党内路线斗争的角度去处理，被杀者既没有得到应有的及时昭雪，杀人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严厉惩罚，一直都留有较多的后遗症。因为观点不同，看法有异，就可以罗织罪名，诛锄异己，这种做法的背后，是左比右好理念的养痍长疽，是一些左倾路线推行者的倚官仗势，这“官”就是他们手中掌握的党的权力，这“势”就是“各次左倾错误路线”以及“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而“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sup>⑨</sup>

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梳理了建党至“七大”期间的三次路线斗争与一系列重大事件，论析了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表现、危害及其社会思想根源；而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主要清点了建国32年来党的发展历程，深刻分析了左倾错误的一再重演及其与“文革”劫难的内在关联。重读这两份重要的党史文献，深深感到在党的发展历史中，左倾错误一直阴魂不散并不时为祸的顽固与剧烈。可以说，党的90多年的壮烈而光辉的历史，主要就是和左倾路线不断斗争并艰难取胜的历史；而花样翻新的左倾错误，也事实上成为阻碍革命事业顺利发展和党的建设持续胜利的最大祸害。

《刘志丹》从小说到大案，纷纷扰扰已经50多年，一些人有权，一些人冤，但最冤枉、最不幸的，应该还是刘志丹，因为他以精诚合作的姿态、宽容大度的风范、力挽狂澜的能力，铸就了他战斗与光辉的一生，但他的英名却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他的精神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光大。因此，走出小说《刘志丹》，走近历史的刘志丹，宣传“群众领袖”刘志丹，学习“民族英雄”刘志丹，仍然是适时、必要和迫切的，而果真如此，刘志丹的在天之灵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2011年6月26日—8月26日；

①1989年11月29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3位军事家：毛泽东、刘伯承、粟裕、林彪、徐向前、叶挺、周恩来、曾中生、彭德怀、朱德、左权、段德昌、叶剑英、许继慎、罗荣桓、聂荣臻、贺龙、陈毅、陈赓、李先念、邓小平、徐海东、黄克诚、蔡申熙、彭雪枫、罗炳辉、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杨尚昆、谭政。1994年中央军委又确定增补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3人为军事家，共计36人。

②刘志丹胞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③刘景范之妻，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

④《从吴运铎到〈刘志丹〉》，引自邢小群：《往事回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访谈录》，第98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⑤即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

⑥包括工人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卷，1984、1985年版第一、第二、第三卷。

⑦⑧李建彤：《刘志丹》（第一卷），1984年版“前言”。

⑨习仲勋：《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习仲勋革命生涯》，第2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⑩修订本里改为何婕好。

⑪刘风梅、王志厚：《谢子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⑫谢子长与陕北根据地属于北方局领导，刘志丹与陕甘根据地属于陕西省委领导。

⑬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726页，第420页注2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⑮据雷恩均回忆，“刘志丹站在旁边，莫名其妙，一个战士过去将刘志丹的枪也收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87页。

⑯关于这一段历史，《谢子长》一书有如下描写：刘志丹要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谢子长不肯接受，一再推让，并对刘志丹认真地说：“我是北方局派来的军事特派员，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确定你当军委会的主席。”

⑰在1979年版的《刘志丹》第一卷中，谢子长是以真名出现的，在1984年版改后的《刘志丹》第一卷中，真名的谢子长改为了化名的方自强。

⑱朱理治：《我到陕北后的错误》，见《西北革命根据地》，第43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⑲《郭洪涛回忆录》，第72—9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⑳就他自己说到的情形，就有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

做检查,之后就通过所在的中央党校向彭真、任弼时去做申诉,致使西北局又在1945年再开“西北党史座谈会”;1955年3、4月间借高岗问题座谈会再做申诉;1956年9月又向党中央提出书面申诉,是年10月中央书记处责成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郭的申诉;1958年又提出申诉与自我检查,该年12月中央监委由刘澜涛主持讨论申诉与审查意见,1959年中央监委于11月23日再做《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80年代初期,因为郭洪涛与其他老同志对西北党史中一些问题均有意见,1983年4月,中央指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等组成五人小组,会同陕甘边、陕北的老同志共同研究西北革命历史中30年代的问题,并在形成意见后由中央印发《五人小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等,见《郭洪涛回忆录》第83—90页。

②①另有“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说。

②②黎之:《文坛风云录》,第36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③《刘志丹》第一卷,第143页,工人出版社1979年版。

②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6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②⑤习近平:《给爸爸88周岁生日的贺信》,《习仲勋革命生涯》,第6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②⑥②⑦参见《毛泽东与习仲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5页,第41页,版本同上。

②⑧《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4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②⑨黎之:《文坛风云录》,第362页。

②⑩马文瑞、张邦英:《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怀念习仲勋》,第45页,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⑪齐心:《我与仲勋风雨相伴55个春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660页。

②⑫李建彤:《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星克尔(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

②⑬李原:《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载《时代潮》2003年第3期。

②⑭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

②⑮《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见“黄土情联谊网·历史文献”,<http://www.htqly.org/>。

②⑯《马文瑞回忆录》,第1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7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②⑱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②⑲《阎红彦传略》,第10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⑳参见《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引自《高岗传》,第36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㉑参见《谢子长》,第31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㉒李建彤:《刘志丹》第一卷“前言”,工人出版社1979年版。

㉓黎之:《文坛风云录》,第365页。

㉔王世泰:《回忆我的红军生涯》,第48页,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

㉕《马文瑞回忆录》,第9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㉖《郭洪涛回忆录》,第9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㉗转引自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440页。

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1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㉙以上引文均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第38—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何吉贤